

# 明代嘉兴及其词人的文化品格

张彤彤<sup>1</sup>

(安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, 安徽 安庆 246011)

**【摘要】:** 环太湖地区的词学研究是明词研究的重中之重, 嘉兴词坛亦是环太湖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作为嘉兴词坛的创造者, 明代嘉兴词人生活在秀美宜人、富庶繁荣的江南一府, 经历了由尚勇至尚节的转变, 最终形成了尚节崇文、淳秀达观的文化品格。

**【关键词】:** 明代 嘉兴 词 文化品格

**【中图分类号】:** I207. 23 **【文献标志码】:** A **【文章编号】:** 1671-3079(2020)03-0011-06

作为明代词坛的重心, 环太湖地区尤为引人注目, 嘉兴词坛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, 据粗略统计, 明代嘉兴词人多达一百三十余人, 词作总量超过了三千首, 其词人与创作于明末清初词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, 这在明代词坛甚至是中国词史上, 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。而这种成就的背后有着不可磨灭的根本性原因, 即明代嘉兴词人生活的环境及其形成的文化品格。

## 一、明代嘉兴的概况

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之外, 文学同时还在空间性和区域性方面存在巨大差异。空间性差异源于不同区域的地理位置、社会经济、风俗文化等方面对文人的直接影响, 并间接表现于文学之中。

### (一) 历史沿革及界定

春秋之时, 嘉兴名“长水”“槁李”, 是著名的吴越战场; 战国时属楚; 秦置长水(后改由拳)、海盐二县; 三国吴时, 因“由拳野稻自生”改为禾兴, 后为避太子讳改为嘉兴; 嘉兴之名, 始于此时。隋一度将嘉兴并入吴县, 唐复置嘉兴县。五代吴越国武肃王钱鏐, 于嘉兴置开元府, 后置秀州, 领嘉兴、华亭、海盐、崇德四县。北宋时赐名嘉禾郡; 又因其为南宋孝宗出生地, 升府。元时改为嘉兴路, 领嘉兴、海盐、崇德三县。明宣德年间, 将三县划为七县: 嘉兴、秀水、嘉善、海盐、平湖、石门、桐乡。至此以后, 嘉兴成为浙西大府、江东都会, 明清两代沿袭不改。

### (二) 自然人文景观

嘉兴在地理上处于杭州湾北岸和杭嘉湖平原的腹地地带, 头枕太湖, 临钱塘、东海之汇, 纵览江河湖海及运河之胜, “东邻上海, 西靠杭州, 北依苏州, 南濒杭州湾, 是长三角的地理中心和交通枢纽。”<sup>[1]</sup>(万历)《嘉兴府志》云:

本郡为浙西大府, 巨海环其东南, 具区浸其西北, 首尾吴越, 襟带苏杭, 又平原衍壤, 海滨广斥, 沿海诸山, 隐隐拱向, 支流千万, 相错如绣, 诚哉泽国之雄, 江东一都会也。<sup>[2]</sup>

<sup>1</sup>基金项目: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(17ZDA257)

作者简介: 张彤彤(1988-), 女, 黑龙江七台河人, 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, 文学博士, 主要研究方向为词学。

地处江南,嘉兴带有其江南水乡的典型特点,府内大小水系交错如绣。这一特点在(光绪)《嘉兴府志》中也得到了印证:

浙西杭州半山半水,湖州亦然。嘉兴水多山少,实为泽国。然澈浦、乍浦滨海皆山,则知扶輿盘郁于东南之气,固不任其坦然,而无所蓄聚也。惟他郡以山源水,嘉郡以山障水异矣。汇为河,停为湖、为荡、为漾,分为泾、为港,澄为泽、为池,而所以防其泛滥、达其程途者,则有塘。<sup>[3]卷十二,1a</sup>

诚然,嘉兴一地“水多山少”,平原广阔如席,惟滨海之地富有山峰,如胥山、凤凰山、长墙山、秦驻山、独山等环在滨海。更多的是湖、溪、浦、河、塘、泾等水系之致:滂湖、天星湖、鸳鸯湖、梅溪、范蠡湖、长水、魏塘、麒麟塘、伍子塘、马塘泾、王江泾等。

在这些山水名目中有许多历史典故,如胥山、伍子塘、范蠡湖,这是因为携李(嘉兴古称)曾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交战的战场,以此嘉兴拥有多处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景胜。除以上几例外,还有相传为黄巾军起义、民避兵处的石屋,秦皇剑池、钱王洗剑处,三国时孙权造战船之地的张练塘,名妓苏小小之墓,带有东坡故事传说的鸳鸯湖。鸳鸯湖是嘉兴名胜,湖中有烟雨楼,始建于五代,几经兴废,明代又多次修建。张岱曾有《烟雨楼》一文提及嘉兴人对烟雨楼的喜爱和烟雨楼当时的繁荣之貌。

嘉兴还有梅花庵一座,是元末四大家吴镇之墓,吴镇自题曰:“梅花和尚之塔。”明万历年间,生员袁士鼐等请于官建庵守之。以吴镇的成就和魅力,梅花庵亦得以著名。

如果说诸多水系将嘉兴化为一个“棋盘”,那么寺观就像棋子一样点缀在嘉兴的各个领域。嘉兴一府寺观密布,各县均有大量寺观。如灵塔庵、黄叶庵、大胜讲寺、西林庵、精严讲寺、慈恩寺、东塔讲寺、漏泽教寺、白莲讲寺等。

这些景致得到关注与喜爱,往往成为文人墨客吟咏描绘的对象。明代沈尧中有《嘉禾十咏》,分别咏嘉禾献瑞、秀水扬辉、滂湖春日、鸳湖秋月、苧村烟雨、真如雪霁、景德晨钟、华严夜灯、长水飞帆、双溪夕照。这“十咏”也被(万历)《嘉兴府志》收录为“郡城十景”。此外,周绍濂《嘉禾四咏》分别咏秀水扬辉、真如雪霁、景德晨钟、华严夜灯;宋代的张尧同更是创作了《嘉禾百咏》,其对家乡的热爱不可谓不深;而最受瞩目的莫过于吴镇的《嘉兴八景图》,他“闲阅图经,得胜景八”:空翠风烟、龙潭暮云、鸳湖春晓、春波烟雨、月波秋霁、三闸奔湍、胥山松涛、武水幽澜,每景皆题《酒泉子》一首,各标题前两字直指景点地址,如此,《嘉兴八景图》以介于地图和山水画之间的形式<sup>[4]</sup>,真实地再现了嘉兴的自然景观和人文胜迹。

不仅嘉兴人为本乡景观叫好,外乡人也为之折腰,并用作品描绘了他们眼中的嘉兴。眉州人陈廷贵曾绘《嘉禾十景》,又由嘉兴姚绶为之作《嘉禾十景序》。此外,宋代陆蒙老有《嘉禾八咏》,朱南杰、陈起作有《出嘉兴》《泊崇德》,岳珂在离任嘉兴时作《嘉定丁卯余守携李,召还,郡人相饯于三塔湾,偶至此寺,有感》;还有元萨都拉之《过嘉兴》;明邓原岳之《送张太守之嘉兴》,董裕之《送吴比部出守嘉兴》。

如果说以上那些景致是自然和历史对明代嘉兴人的馈赠,那么园林则是他们以己之力为嘉兴人文景观增添的笔笔风景,表达了对家园与生活的热爱。明代嘉兴园林颇盛,著名者如:周履靖之梅墟、支如玉之梅花渡、魏大中之藏密斋、魏学洵之茅檐、钱士升之积翠园、遁溪与钱继章之默溪……此类园林大都清新素雅、追求自然、不好奢华。朱彝尊云:“吾乡鲜严整之胜。然园亭之参错,水木之明瑟,舟楫之沿洄,纵游览所如而不倦。”<sup>[5]605</sup>诚如也!

嘉兴的自然环境清新优美,水系广布,相错如绣;寺院众多,庙宇林立;园林发达,浑然天成。自然与人文,历史与当下,共同铸就了明代嘉兴的风景与面貌。

### (三) 社会经济

六朝时嘉兴府便已誉满天下, (雍正)《浙江通志》云:“嘉禾一穰, 江淮为之康; 嘉禾一歉, 江淮为之俭。”<sup>[6]4418</sup> 至元代, 这种地缘优势发挥了更大的作用, 从而惠泽全国, 《元一统志》赞曰:“擅湖海鱼盐之利, 号泽国秔稻之乡。”<sup>[7]581</sup>

嘉兴在明代则发展出“高原树桑麻, 下湿种禾稼”( (弘治)《嘉兴府志》)多元化的农业生产模式, 以致“泉多于桑, 布浮于帛, 士大夫家勤女工, 犹什之七”。(《平湖县志》)明中叶, 朝廷在嘉兴设立了官府织染局, 嘉兴的蚕桑业遂跃居全国第二位:“吾郡蚕丝之利亚于湖州。就七邑中石门、桐乡育蚕最多, 次则海盐, 又次嘉兴、秀水、嘉善、平湖。此事罕及。”<sup>[3]卷三二, 22a</sup> 呈现出桑柘遍野、蚕箔如山、蚕丝成市的盛况。随之而来的是手工业和商贸的发展:“民务织丝纴, 颇著, 中下声亦业农贾商旅辐辏与王江泾相亚。”<sup>[8]</sup>嘉兴发达的种植业和工商业在惠泽本府和江淮人民的同时, 还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:“嘉善膏腴之壤, 平铺如席。无高山大泽, 赋税户口最为繁盛。”<sup>[6]1776</sup>

要之, 嘉兴“巨海环其东南, 具区浸其西北, 表里吴越, 首尾苏杭, 井邑繁雄, 漕贡辏集, 而又平原沃壤, 海滨广斥, 饶于稻粱、鱼盐之利, 而丝帛之属视苕霅次之, 实江左之泽国, 浙右之会府也。”<sup>[9]</sup>嘉兴词人生长于如此的自然、人文、经济环境中, 其文化品格遂产生了强烈的个性化色彩。

## 二、明代嘉兴词人的文化品格

虽然与苏吴、云间、杭州等府郡具有相近的地理位置和生活环境, 但是由于具备了独特的自然、人文、经济环境, 所以嘉兴人的文化个性便呈现出与周围府郡不尽相同的特征。具体来说, 明代嘉兴词人的文化品格, 经历了由尚勇至崇文的转变, 最终形成了淳秀而达观的特点。

### (一) 尚节崇文

嘉兴古属吴越之地, 两国连年征战, 尚勇之气蔚然成风, 《汉书》即曰:“吴粤(越)之君尚勇, 故其民至今好用剑, 轻死易发。”<sup>[10]</sup> 至明代, 嘉兴人的尚勇品格则演变为对气节、节义的秉持和崇尚:

平湖多秀民, 天性巧慧, 重文学、尚节义。<sup>[6]1777</sup>

魏塘忠孝节义, 甲于嘉禾。理学科名, 声高东郭, 麟麟炳炳, 自昔攸闻, 谓非教育涵养者深欤。<sup>[3]卷三四, 22a</sup>

尤其在家国危亡的历史关头, 嘉兴人中更是涌现出大量的刚正不阿、坚持真理、临危不惧、舍生取义之士。

如堪称明廷忠臣者:靖难之变, 程本立自杀殉君; 明中期的抗倭中, 都督张经在嘉兴王江泾就取得了大捷, 创嘉靖抗倭首次大捷; 黄洪宪不畏权势, “万历丁丑, 分校礼闱。江陵欲属其子, 洪宪不可, 江陵廷责之。声色俱厉, 弗为动”;<sup>[6]3116</sup> 晚明的袁黄、魏大中、钱士升、徐石麒、陈龙正、钱继登等与高攀龙、顾宪成交往密切, 名列东林; 1 其中, 魏大中死于瑯祸, 为“东林六君子”之一, 与长子魏学溍一同被封为忠臣孝子; 钱士升、陈龙正、钱继登等为积极援救魏大中等奔走呼号、与奸佞对抗; 文坛上, 魏大中之子魏学濂、钱继登之弟钱继章二人发起了“虞美人花倡和”, 钱棨《虞美人花词跋》云:

有美虞姬, 化斯芳草, 不随桃李, 常亲鲁国衣冠; 独尔掀翻, 似笑炎刘灰烬。……实因仗胜, 永为楚国忠臣。昔稽康述怀香之赋, 宗泽图百花之带, 孰若表斯幽质, 招彼风流? 美人不死, 曷咎天亡? 妆镜常留, 自能怜我。<sup>[11]</sup>

家国之念, 何其深矣! 此倡和除魏学濂三人外, 还有嘉兴彭孙贻、吴熙、刘芳、潘炳孚, 华亭宋征舆、宋征璧, 上元黄周星, 钱塘徐士俊、卓人月, 长洲尤侗, 仁和高濂, 诸暨赵式, 乌程沈三曾等, 堪称一场爱国主题的词学盛会。

当国家危亡之际,嘉兴轻死重节的凛凛风骨再次焕发:清兵克嘉兴,徐石麒自缢,陈龙正绝食;南京陷,钱梅与婿夏完淳共死;嘉兴县学生钱应金因未剃发被杀(应金字而介,一字仙上,嘉兴县学生。城破,走村居,游兵掠郊野,见其发未开剃,遂见杀。有《古处堂集》。雅以诗词名,而今存者无几);<sup>[5]1627</sup>明廷倾灭后,许多人选择隐居避世:沈泓逃禅,钱继登、钱继振、钱继章、钱棻、王屋等以遗民自居,钱继登改其园林名曰“客园”,家国易代,客居尘世之心可见……魏学渠在《柳洲诗集序》中称赞柳洲文士“尚节义”,而“尚节义”实乃嘉兴文士之共同属性。

从轻死之勇到重道之节,这期间体现着浓厚的文学教化意义,且经历了漫长的过程,其中重要的历史事件则可远溯至晋代的永嘉之乱。这次重大变故造成大批北方士人迁徙江南,当地民风随之转变,一如刘槃《成化记》所载:“永嘉以后,衣冠避难,多萃江左,艺文儒术,斯之为盛,盖因颜谢徐庾之风焉。”<sup>[12]</sup>“永嘉以后,帝室东迁,衣冠之族多渡江而南,艺文儒术于斯为盛。”<sup>[13]</sup>民风开始由尚武向崇文的方向转变。南宋时,嘉兴毗邻都府临安(杭州),又是宋孝宗的出生地,作为“三辅”之地,其政治、经济的影响力大大提升,文化亦然。宋张镇记曰:“嘉禾今三辅大郡,奇才秀士辈出,四方逢掖,远走是邦,辐辏鳞集。”(光绪)《嘉兴府志》亦载:“(石门)邑境密迩于杭,自宋南渡,士大夫游处,旧多文儒,士习礼义。”<sup>[3]卷三四,2a、8a</sup>衣冠文士与文化艺术深刻影响着嘉兴。至明代,这种崇文尚雅、喜好读书的风气更加普遍:

嘉禾之俗……士人好文而崇学,衣冠文物焕然可观。<sup>[6]1775</sup>

石邑接壤杭湖,士大夫尚文学,习礼义。<sup>[6]1777</sup>

乡之士大夫好读书,虽三家之村,必储经籍。<sup>[14]</sup>(朱彝尊《佟太守述德诗记》)

桐邑,古吴越之疆,……慕文儒。<sup>[15]</sup>

仰慕文儒、崇文好学蔚然成风,官学、私学、书院林立,书画鉴赏及收藏家项元汴、李日华等人集于大成,藏书家项笃寿、项圣谟、曹溶等人闻名四海,周履靖于出版方面为文献保存与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,科举方面嘉兴名列浙江第三,颇具成就的女性词人纷纷出现等等,凡此种种,均为嘉兴崇文风气的重要表现。

在这种崇文好学的风气下,嘉兴词坛迎来了尤可傲人的成绩。尤其至晚明,词坛呈现四大词派——柳洲、梅里、西陵、云间,其中嘉兴独占其二。邹祗谟《远志斋词衷》云:“词至柳洲诸子,凡二百余家,可谓极盛。”<sup>[16]</sup>其中的王屋、王翊、曹溶、曹尔堪等人在明清之际的词体意义重大,曹尔堪更是在清初引领三次倡和影响清初词坛;他们的后辈,生于晚明、成长于明清易代之际的朱彝尊在嘉兴热土的滋养下,在嘉兴前辈的引领和带动下,在风云际会的时机中,终于成长为一代文坛宗师,为嘉兴文坛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。

## (二)淳秀达观

《元一统志》描述嘉兴风俗曰:“其俗淳秀,慕文儒,勤农务。”<sup>[7]580</sup>可知,在尚武、崇文之外,淳秀亦是嘉兴人的重要个性。

“淳秀”,即淳朴、朴素、节俭。苏吴、云间、杭州等郡稍显浮华的风俗自古而然,苏轼《上执政书》即云:“三吴风俗自古浮薄,而钱塘为甚。虽室宇华好,被服粲然,而家无宿春之储。”《方輿胜览》记杭州曰:“市列珠玑,户盈罗绮。湖山信美于他邦,狱讼亦烦于诸郡。”《钱塘县志》对此表达得相对含蓄,却也不难看出杭州的尚华之风:“妇女虽喜华服饰,而闺阁之习尚勤。”<sup>[6]1771-1772</sup>

杭州如此,苏州更甚。弘治年间王铨描述了苏州由萧条复至繁荣之状:

---

邑里萧然，生计鲜薄，过者增感。……以至于今，愈益繁盛。闾檐辐辏，万瓦秋鳞，城隅濠股，亭馆布列，略无隙地，……凡上供锦绮、文具、花果、珍馐奇异之物，岁有所增，若刻丝累漆之属，自浙宋以来，其艺久废，今皆精妙，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。<sup>[17]</sup>

袁宏道在《龚惟学先生》中亦慨叹苏州之繁华：

若夫山川之秀丽，人物之色泽，歌喉之婉转，海错之珍异，百巧之川凑，高士之云集，虽京都亦难之。<sup>[18]</sup>

相比袁宏道的陶醉感叹，清代袁学澜之语更有批判意味，其《姑苏竹枝词七言绝句》序云：

夫吴中素号繁华，袂云汗雨，珠服玉饌，宴会则酒池肉林，第宅则连疆兼巷。奢靡之风，至今犹昔。然而家鲜盖藏，徒侈观美，外务浮饰，内实耗匱。<sup>[19]</sup>

相比之下，嘉兴的“淳秀”之风就显得尤为突出：

(海盐)俗朴而好文，俭而知义。<sup>[6]1398</sup>

土膏沃饶，风俗淳秀，文贤人物之盛，前后相望。<sup>[6]1775</sup>

(石邑)至重桑麻，勤稼穡，民多淳朴。<sup>[6]1776-1777</sup>

江南之地，人杰地灵、钟灵毓秀。“秀”可谓江南士子的总体描绘，而“淳”则应属嘉兴士子的独有标签，具体内涵是：不张扬造作，不奢靡狂妄，质朴敦厚，斤斤自好。

这种淳秀俭朴、没有强烈功利欲念的特质，不同于唐寅型才子的“外放内苦”：“不炼金丹不坐禅，不为商贾不耕田。闲来写就青山卖，不使人间造孽钱”的唐寅何其潇洒，而其“此乐恨不令太白知之”又是何其狂放！然而在给朋友书信中，唐寅却是另一番面目：

墙高基下，遂为祸的。侧目在旁，而仆不知，从容晏笑，已在户口。庭无繁桑，贝锦百匹，谗舌万丈，飞章交加。至于天子震赫，召捕诏狱，身贯三木，卒吏如虎，举头抢地，泣泗横集。而后昆山焚如，玉石皆毁，下流难处，众恶所归。……海内遂以寅为不齿之士，握拳张胆，若赴仇敌。……<sup>[20]</sup>（《与文征明书》）

由此可见，科场舞弊案后唐寅内心的痛苦与彷徨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。对于唐寅内外不同的表现，钱谦益独具慧眼地指出其“外虽颓放，中实沉玄，人莫得而知之”的悲哀，可谓恰切。诚然，唐寅这类才华横溢而仕途坎坷的文士大都有些狂狷和不平之气，因此骄傲与自负极易使其外似颓放，但理想渺茫又使其苦不堪言。对此，知者自可得其苦，不知者只能得其放。吴中才子正是这般令人爱怜忧叹。

相比之下，嘉兴文士的个性则要温和达观得多，可谓达观自适者。他们心怀理想，在恰当的时机积极入世；然如若遇到困境，亦能够坦然面对，并在生命的其他方面得到宣泄，达到内心、精神上的平衡。

如在文人最关心的仕隐问题上，他们常常持有一种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的达观心态，由此他们能够坦然而自适地面对宦海沉浮，即便在归隐之后，也能于书画、游艺之间过着潇散自在的生活并自得其乐。贝琼《云林解》言：“夫时隐而隐，未始忘乎仕；时仕而仕，未始忘乎隐。卷舒进退，合乎道之当然，毋足怪者。”<sup>[21]</sup>堪称是这种仕隐观的注脚。

周履靖因为身体病弱，遂弱冠之年便放弃了科举，而尤热爱书文，致力于文献出版，并不怨天尤人，《梅颠道人传》称其“生平酷研文字，荒墟惟栽梅树，颠而成号焉。恬淡寡言，厌趋禄利”。<sup>[22]</sup>虽为布衣，但生活却平淡而丰富多彩，其自言曰：“闲窗净几，阔庵枯坐。始得恣屯、柔翰，旁及书画鼎彝诸谱，至草木虫鱼，天星地术，异域方言，无不涉入。”<sup>[23]</sup>亦可见其闲逸雅趣。

周履靖的外甥李日华屡仕屡归，从容淡然。钱谦益评李日华：“君实以进士起家，官至列卿，后先家居三十余年，修洁如处子，淡荡如道人，静退如后门寒素。”<sup>[24]</sup>李日华的门生谭贞默亦对其仕隐作了精到的总结：“世固有通籍四十四载中更乞侍养者二十四载、乞休沐家食者前后十载、立朝服官日无几何、难进易退、蝉脱知几其人如先生者乎哉！”晚年祈归，获“李某孝思恬致可嘉，着照旧供职”<sup>[24]17-19</sup>（谭贞默《明中议大夫太仆少卿李九疑先生行状》）之旨，是其恬淡雅致性情的最高认可。

状元及第是士子们梦寐以求的，然钱士升得中状元后并没有得意忘形，却显得尤为平静和清醒，其写信给儿子钱棫曰：

廿八日午后得报，且喜且惊。以我凉德，何以堪此厚福。此皆我祖父积累所致，不可自恃而忘厥本也。……淡泊明志、宁静致远两言当谨识之。<sup>[25]</sup>

喜悦之情自是有的，同时还有“惊”，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意得志满，而是成绩来自祖上的福德。同时，提出此时更应收敛情绪，要以“淡泊明志、宁静致远”二语为要。第二封信中，他还教导钱棫闭门读书：“汝在家只宜杜门读书，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。”第三封信中还涉及为人处世之语：

四方问遗，一概谢却。即素所相知者，亦矢不敢承。……尔儿辈在家只管闭户读书，勿见要人，勿谈朝事，勿落近日名士气习。严以律己，谦以下人。至于奴仆务须约束，毋得放恣，庶几弗玷高曾清白家风。<sup>[25]</sup>

骤然名满天下，其谨慎之状如此！不仅严于律己、告诫子辈，还考虑到对家仆的管理和规范。

在儿子钱棫中进士后，钱士升又言：“我家自柏峰公以来，魁名五代，而汝独早独逸。又得联隼，真是人生难遇。趁此时急急收敛精神，打叠向上，何难？若一放倒便不可支矣。”<sup>[25]</sup>告诫他要收敛精神、不可懈怠。

钱继登二十三岁及第，而这种顺遂并没有让他养成娇弱、不堪波折的个性。其后遭讪被遣时，他“处之淡然，日惟闭户著书，若不知身在迁谪者”。<sup>[26]</sup>其面对逆境同样安之若素，荣辱不惊。

综上，有着绝佳地利优势的嘉兴，其文化风气经历了由“尚勇”到“尚节”的转变，每当君臣大义、家国存亡之际，这种品格便会爆发出来，闪现出人性的光辉；除此之外，嘉兴还有浓厚的崇文尚学之风，是江南文化风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同时，与周围的苏杭等地相比，又体现出了淳秀、达观的文化个性。这些独特的文化品格对嘉兴词人的创作有着决定性影响。

#### 参考文献：

[1]舒国增. 浙江概览(综合卷)[M]. 杭州:浙江人民出版社, 2011:151.

[2]沈尧中. (万历)嘉兴府志[M]. 刘应铎, 修. 1600(万历二十八年)刊本. 台北:台湾成文出版社, 1983:72.

[3]吴仰贤, 叶廉锷, 谭逢仕, 等. (光绪)嘉兴府志[M]. 许瑶光, 修. 光绪四年刊本. 台北:台湾成文出版社, 1970.

[4]吴为山, 阮荣春. 中国美术研究[M]. 南京:东南大学出版社, 2015:51.

- 
- [5]朱彝尊. 静志居诗话[M].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90.
- [6]嵇曾筠. (雍正)浙江通志[M]. 北京:商务印书馆, 1934.
- [7]李兰盼, 岳铉, 虞应龙, 等. 元一统志[M]. 赵万里, 校辑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66.
- [8]黄洪宪, 项士濂, 姚世华, 等. (万历)秀水县志[M]. 李培, 汪文璧, 陈嘉谟, 等, 修. 1596(万历二十四年)刊本. 台北:台湾成文出版社, 1970:34a.
- [9]赵文华. 嘉兴府图记[M]. 明嘉靖刻本. 台北:台湾成文出版社, 1983:108.
- [10]班固. 汉书·地理志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3:1150.
- [11]钱棻. 萧林初集[M]//四库未收书辑刊:6辑第28册. 北京:北京出版社, 1997:32.
- [12]胡朴安. 中国风俗[M]. 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13:82.
- [13]杜佑. 通典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88:4850.
- [14]朱彝尊. 曝书亭集:卷三十八[M]//四部丛刊初编:1697册. 上海:商务印书馆, 1936:9a.
- [15]严辰. (光绪)桐乡县志[M]. 台北:台湾成文出版社, 1970:85.
- [16]唐圭璋. 词话丛编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86:657.
- [17]冯桂芬. (同治)苏州府志[M]. 李铭皖, 谭钧培, 修. 南京:江苏古籍出版社, 1991:138.
- [18]袁宏道. 袁宏道集笺校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8:239.
- [19]苏州市文化局. 姑苏竹枝词[M]. 上海:百家出版社, 2002:92.
- [20]唐寅. 唐伯虎先生集[M]//续修四库全书:1334集部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2:618.
- [21]贝琼. 清江文集:卷三十[M]//文渊阁四库全书:集部1228册. 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 1986:503.
- [22]陶潜, 周履靖和韵. 五柳庚歌(第四卷)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85:214.
- [23]周履靖. 螺冠子自叙附传赞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91:2.
- [24]李日华. 恬致堂集序[M]//恬致堂集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2.
- [25]钱士升. 赐余堂集[M]//四库禁毁书丛刊:集部第10册. 北京:北京出版社, 1997:520.

---

[26]钱继登.序[M]//壑专堂集.刻本.1667(康熙六年).

**注释:**

1 他们的后辈如钱继章、钱继振、钱栴、钱棻、钱默、钱熙、魏学濂、魏学洙、魏学渠、曹尔堪、支如增等身属复社。